

金圣叹

小说理论与

戏剧理论

郭瑞



金圣叹小说理论与 戏剧理论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与戏剧理论

郭 瑞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3插页 306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 7-5059-1864-8/I·1296 定价：9.80 元



作者小传

郭瑞，1945年出生于上海，祖籍黑龙江省宾县。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获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文艺理论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现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文教宣传司工作。曾发表通讯、文艺作品、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学术论文等约150万字，并出版《论人物性格与人物体系》等著作。

前 言

—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由明入清后更名人瑞，号圣叹，吴县（今江苏境内）人，是我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他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博学多闻，著述宏富，好为怪诞之论，是明末清初文坛上的天才，怪杰。他的研究和著述范围相当广泛，涉及文学、哲学、佛学、史学诸多领域，而以文学批评著称于世。他以《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为世间第一、二、三、四、五、六才子书，计划一一加以评点，竣事的有第五、第六才子书，《杜诗解》基本完成，而对《离骚》、《庄子》只有片断的评论，《史记》则未能触及。此外，他还评论过不少古典诗词、散文以及诸宫调《董西厢》。他对评点对象的选择，表明了他深远的文学目光。它们不仅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辉煌代表作，而且涉及了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等各种体裁。

金圣叹通过自己的文学批评活动，主要是对《水浒传》、《西厢记》的评点，为改变与提高小说、戏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了突出贡献。我们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传统中，居于正统地位的是诗文（包括赋），而小说和戏剧在正统文

人眼里不过是小道、末技，没有什么地位可言。鲁迅就曾指出过这种现象：“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①，朱自清也说过：“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和曲（包括戏曲）直到新文学运动的前夜，却还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紧的地位。”^②

小说、戏剧地位的根本性改变固然是“五四”前后的事情，但为这种改变所进行的舆论准备却早就开始了。明代李贽就曾将《西厢记》、《水浒传》与诗文并提，视之为“古今至文”，公安派曾将《水浒》与《史记》相提并论，而金圣叹的措辞尤为激烈。他竟然提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施耐庵《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又说“可将《西厢记》与子弟作《庄子》、《史记》读”。这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不能不说是正统文学观念的一种异常勇敢的反叛。对于金圣叹的用心，李渔看得很清楚：“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绝大文章”^③。应当说，金圣叹是奠定小说、戏剧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先驱之一。

金圣叹通过对《水浒传》、《西厢记》两部经典文学作品的全面、深入的分析与评价，不仅充分肯定了它们的文学成就，而且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关于小说、戏剧和文艺的见解，为我国古代小说理论、戏剧理论、文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金圣叹的工作为历史所肯定。《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产生了重大而久远的影响，成为直到解放前近三百年间《水浒传》、《西厢记》刊行最多、流传最广的版本。而他的小说、戏剧

① 《鲁迅全集》第6卷，第231页。

②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第110页。

③ 李渔：《闲情偶记》卷一。

评点也作为这两部书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得以广泛传布。遗憾的是，直到数年后，这份弥足珍贵的遗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

金圣叹名气颇大，然而他本人及其著作的命运却是悲剧性的。

历史上常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金圣叹便是一例。他幼时家贫，眷属凋丧，壮年正值明亡，入清后绝意仕进，专以读书著述为务，对清王朝取不合作态度，终因抗议贪官污吏暴行的“哭庙”案而被斩首，家产籍没，妻子流放宁古塔。他的著作因生前家贫无资，刊刻十分艰难，散佚颇多。他的文章愤世嫉俗、倜傥不群，常与传统观念牴牾，因而遭到恶毒攻击。譬如，刘廷玑曾说，金圣叹“虽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贼盗”^①。归庄说，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是“倡乱”，批评《西厢记》是“诲淫”，“罪不可胜诛”^②。还有一个叫铁珊的说什么“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归’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③，竟把金圣叹惨遭杀害说成是评点《西厢》的报应。金圣叹的第五、第六才子书则被一再列入清政府颁布的毁禁书目。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同一个金圣叹，他在封建社会中的厄运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结束。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金圣叹又被扣上了“反动的封建文人”的政治帽子，从而成为学术研究避之不及的人物。

不能不说，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不同的时代，

① 刘廷玑：《在园杂志》。

② 归玄恭：《诛邪鬼》。

③ 铁珊：《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

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竟得出了一致的否定结论。对导致这种情况的解释无非是两种：一是金圣叹具有一种为一切时代和社会所不容的思想，这种解释恐怕没人接受；二是金圣叹的思想包含着非常复杂的矛盾，这使得对历史缺乏辩证思维的人们感到困惑。我以为问题恰在这里。因此，要想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其思想中的矛盾。

金圣叹身上汇聚了深刻的历史矛盾。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发展和确立，古老的封建社会内部酝酿着重大的变化。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思想、个性解放思想、人文主义思想形成了一股启蒙思潮，与传统观念发生了剧烈冲突。金圣叹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经历着巨大历史转折的时代。这个时代所包孕的矛盾在这位天才人物身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他的头脑中既有朝气蓬勃的新观念，也有迂腐不堪的旧意识，两者以一种十分复杂的矛盾状态交织在一起。让我们具体地加以说明。

在金圣叹的社会政治观念中，出现了一定的民主意识。他曾说：“大君不要自己出头，要放普天下人出头，好民好，恶民恶。所谓让善于天，天者民之谓也。”^①他认为，在国家治理方面，君主应当尊重人民的意志，以人民的意愿为转移，并竭力创造条件使人民的意志、意愿有可能得以实现。他在强调天子必须要“恭己”时写道：“譬如有磨子，必有磨脐……磨子打下来，毕竟磨脐歪了……所以磨子转得如法，单赞磨子，不赞磨脐；到得不如法时，单责磨脐，不责磨子。”^②他以磨子喻人民，磨脐喻天子，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民对于社会正常发展

① 金圣叹：《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上海杂志公司，中华民国廿四年十二月初版，第54—55页。

② 金圣叹：《唱经堂才子书汇稿》第55—56页。

的重要作用，并且认为，社会的运转假如出了问题，首先怨不得人民，而应由君主承担责任。这与他在《水浒传》评点中“乱自上作”的思想是一致的。然而，与此同时，他的社会政治观又有相当保守以至反动的一面，把可能破坏封建制度和秩序的人民起义视为叛逆行为。坚决反对“忠义归于水浒”的说法。封建的国家观念在他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尽管他对皇帝有时也讥讽、怨愤以至指责，但一朝受到圣上赏识，又感激涕零得无以复加。

与其社会政治观念相比，他的伦理观念、人性观念则要解放得多。他固然说过“先王制礼，万万世不可毁也”之类的话，但在实际上，他却更多地、更坚决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本性和感情。这在有关《西厢记》的评点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不少研究者认为，金圣叹关于《西厢记》的评点暴露了他维护封建礼教的立场，而在我看来，这是不公平的，恰恰是在这部著作中，金圣叹对封建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都发出了挑战。理由之一：金圣叹选择为封建正统观念所不容的《西厢记》作为经典作品加以评点，力图奠定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他的基本立场是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青年男女一边，而不是在封建礼教一边。理由之二：金圣叹对于青年男女之间自然发生的爱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一种可以令人“不辞千死万死，而几几乎各愿以其两死并为一死”的“必至之情”。青年男女的自由结合，是使天“大快”的事情。在“情”与“礼”的冲突中，他显然站在了“情”的一边。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可能无所顾忌，但他对“礼”的某些牵就、退让不是以牺牲崔张爱情为代价，而是为了箝制卫道者的攻击，保护其合理性，这也是相当明显的。理由之三：崔莺莺、张生是符合金圣叹审美理想的人物，是他心中的“宝”，而他（她）们身上最鲜

明的特征则是对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大胆追求。这符合当时时代进步的潮流。理由之四：难得的是，在崔张的爱情关系中，他又特别关心和同情妇女的命运。他不仅认为莺莺是全剧最重要的主人公，而且对“改过”之说深恶痛绝。理由之五：金圣叹竭智尽力地为崔张的行为辩护，对卫道者散布的种种谬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诅咒那些诅咒《西厢记》是淫书的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他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他们虚伪的嘴脸：“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他指出，青年男女相互追求，自由恋爱，以至结合、生育，本是天地中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理由之六：金圣叹认为，男女之间的相互倾慕、爱恋与生理上的要求、性的要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完全符合人的自然本性，而硬把两者说成是互不相干的两回事情，则是说不通的，“好色而不淫”不过是那些不敢公开承认人的性本能的道学先生们自欺欺人的谎言。理由之七：金圣叹实际上是“爱情是永恒的主题”的倡导者：“自古至今，有韵之文，吾见大抵十七皆儿女事此事。……为文必为妙文，而非此一事则文不能妙也。”在三百年前的文坛上，这实在是一种大逆不道的怪论。由以上可以看出，金圣叹在伦理、道德领域中向正统的封建观念发动的攻击是相当勇猛的。当然，有时他也不能不受到他攻击对象的束缚，因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但总的说，这种束缚较之社会政治观方面要少得多。

金圣叹的矛盾还表现在，他从儒家经典中接受的传统观念与他从切身的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的认识常常存在很大裂隙。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物，尤其是知识分子，他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不可能不受到他那个时代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对于生活在封建社会晚期、从小就系统地接受儒家经典的金圣叹来说，尤为如此。然而，他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并

未因此而丧失独立的思考。社会的动荡，家境的衰落，发达的哲学思辨能力，对与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酷爱，使他经常不是从传统经典出发，而是从生活经验和社会现实出发，去观察、思考问题和解释文学现象，从而得出更接近真理的认识。

譬如，他对于梁山起义者的看法就是如此。根据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的教条，金圣叹反对“忠义在水浒”的观点，表现了维护封建国家、仇视起义人民的立场，他的政治观念和感情态度显然是反动的。然而，当他深入到《水浒传》所展示的北宋末年黑暗的社会生活之中，面对一个又一个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好汉时，他的感情、态度却变化得判若两人。他对许多梁山英雄的人格表示了钦敬之情，对于他们的遭遇和处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导致他们悲剧命运的社会状况表现了强烈的愤慨。在他看来，把起义者逼上梁山的，不是别人，正是上层统治集团。

金圣叹的生活、审美体验与其头脑中封建经典教义之间的冲突也存在于对《西厢记》的评价中。他一面摆出维护礼的庄严姿态，大讲特讲什么“君子立言，虽在传奇，必有礼焉”，甚至指责老夫人放莺莺出去散心也是一种于礼考虑不周的不慎之举。但另一方面，他对于后来老夫人赖婚的行为又十分愤慨，而对于莺莺和张生却是无限怜爱，万分同情。在崔张和老夫人的冲突中，他的立场显然是在崔张一边。

由上可见，在文学批评中，他的生活经验、审美情感是经常与儒家教条发生着矛盾的。一般说来，当他依照经典进行说教时，常常显得抽象、板滞，强辞夺理，令人生厌，而当他结合着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审美评价时，则总是十分生动、具体、恰切，让人觉得亲切、信服。若说他对

封建正统观念“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有意为之，恐怕是牵强的；但若说他的文艺观和美学观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是较多地符合了时代的进步潮流与社会生活的现实的，却决没有夸大其辞。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的文学批评中精华多于糟粕。

最后，金圣叹的矛盾还表现在他的哲学观方面。金圣叹是一位哲学思想极其丰富，哲学思辨能力异常发达的文艺批评家。在他的哲学观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是从《易经》、老庄哲学、佛教哲学中吸取的朴素辩证法的积极因素。当这种因素与朴素唯物主义成分相统一的时候，往往显得十分有力，然而，当这种因素与唯心主义、特别是历史观方面的唯心主义掺和在一起的时候，则失去了原有的光彩。金圣叹作为一位文艺批评家，主要是结合着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创作实践来谈论哲学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常有精彩的阐发。譬如，他对“极微”论、“有无”论、“挪辗”说，“因缘生法”、“格物致知”的论述便是如此。

“极微”论是公元前五世纪顷印度佛教胜论派提出的一种理论，金圣叹在谈论作家观察生活和事物的思维方法时借用了这一概念。他对“极微”论的解释应当说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这也是对老子“有无”论做出的唯物主义的解答。在阐释“极微”论的过程中，金圣叹对于朴素辩证法做了精当的表述。“极微”的物质构成了事物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方面；而既然物质是“极微”的，那么就可以无限地加以区分、分割，这是另一个方面。正如火焰可以“分焉而得分，又徐徐分焉，而使人不得分”。金圣叹的“挪辗”法则是从认识事物、从事创作的方法方面对“极微”论的运用，要求作家根据“极微”论的道理去分析事物、把握事物，并充分展开自己的创作构思。在另外一些地方，金圣叹表述了可以将事物分成相

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的思想。他在《语录纂》·《杂华林》中写道：“……壶蜂飞起时，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再数他不尽。……如上为因，下为缘；下为因，上为缘；以至上为因，前后为缘，下为因，左右为缘，前后左右为因，上下为缘等，极之无量无边，不可说。”在他看来，无量无边的世界、世间的无穷变化，都是由互相联系着的因（主要条件）与缘（辅助条件）互相作用的结果。他反复强调的“因缘生法，一切具足”、“因缘生法为……文字总持”，“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缘故”，都是要求作家要把事物的因果联系、变化的条件把握好。他还进而指出，事物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又是彼此渗透的。他写道：“刚是在柔里边刚，柔是在刚那边柔”^①，“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销陨在花里边去；花看人，花销陨到人里边来”^②。后面一段话不但讲主体对客体的作用，而且反过来，又讲客体对主体的作用，这就把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看成了一个统一的过程。象这样一些地方表明，金圣叹的辩证法虽然是朴素的，但也有许多相当深刻的地方。此外，他还对“格物致知”这个争论已久、既可做唯物主义解释也可做唯心主义解释的著名概念做出了倾向于前者的说明。关于人的思维活动，他猜测到，是人的头顶卤门部分（即脑）而非心具有“思”、“想”的功能，力求为人的思维活动寻找生理的、物质的基础。同时，他还认为，人的知识的获得，人的思维活动的展开，与人的感官对外界的反映是分不开的。这种见解与所谓“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格物”即“格心”（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显然是不同的。在肯定金圣叹哲学观中的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论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

①② 《唱经堂才子书汇稿》第64、48页。

它们毕竟是很不彻底的。这两者有时候是统一的，但在另一些时候，却与唯心主义、宿命论、虚无主义杂揉在一起。在涉及社会历史领域时尤其如此。另外，当时自然科学的落后状态，也使他很难进一步发展具有萌芽状态的唯物主义的認識论。

从以上的粗略介绍中可以看出，金圣叹世界观的各个方面都是充满了矛盾的。但总的来看，尽管儒家正统观念、封建伦理观念、唯心主义对他仍有相当严重的束缚，但民主意识、人性观念、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审美观、素朴辩证法和唯物论在他的思想中却占据着更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明清之际反对宋明理学、提倡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斗争中，他是站在进步潮流一边的。

在金圣叹身上出现这种矛盾现象当然不是偶然的。巨大的社会历史变动常常造就出一些这样的人物来。恩格斯在评价歌德时曾写道：“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①这种分析对于我们理解金圣叹身上的两重性和矛盾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我看来，他的天才恰恰在于他的矛盾，在于这种矛盾内在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在于这种矛盾所凝聚与反映的社会历史内涵。传统思想的禁锢是严重的，然而，他却敏锐地感应到时代的要求，力图摆脱他本来不可能彻底摆脱的束缚，在看不到光明前景的时候仍然向着黑暗的壁垒发动着冲击。他不是完人，也未能免去封建士大夫之俗，但他却是一个个性异常鲜明、富于叛逆精神的人，一个睿智、勇敢、特立独行的批评家。金圣叹的主要活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领域是文学，我们不必过多地在政治、道德方面苛求他。把他的矛盾与文学批评活动结合起来，从文艺学、美学和历史的方面给他以公允的评价，这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三

金圣叹是以其评点，主要是小说《水浒传》、戏剧《西厢记》评点闻名于世的。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些评点呢？它们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如何呢？和对金圣叹其人的评价一样，近三百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歧见纷呈，争论不已，时至今日，似也没有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

让我们先介绍一下对金评的不同评价。

在金圣叹生前和身后，许多人对金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李渔指出，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艺术价值、美学价值所做的评价是最中肯、最恰切的。他说：“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人患不为王实甫耳，焉知数百年后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①金圣叹的叔伯兄弟金昌从之学《易》二十年，认为其评点已与所评之书的生命、命运结合在一起了：“夫人生世上，不见唱经（金圣叹有“唱经堂”，此即指其人——笔者）书，即为不见如上诸书矣。”^②冯镇峦高度评价了金评对小说、戏剧流传的作用：“金人瑞批《水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故虽小说，院本，至今不废……”^③有人甚至附会说其前生为狐、为僧，

① 李渔：《闲情偶记》三卷《填词余论》。

② 金昌：《杜诗解·才子书小引》。

③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见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页。

以后，学术界对金圣叹及其评点可以说基本上未做认真研究和写作时下笔机辩澜翻，常有神助，死后亦为神焉。时人对其文学批评超群绝伦的才华的仰慕可见一斑。

不过，对金评讥消、痛诋者亦不乏其人。董含认为，金评主观武断，琐屑杂乱：“圣叹恣一己之私见，本无所解；自谓别出手眼，寻章摘句，琐屑割裂。”①《艮斋杂说》抨击其对唐诗的评点是“腰斩之也”②。还有些人认为金圣叹不黯戏剧及其演出规律。如李渔说：“……圣叹所评，及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学之三昧，圣人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③这些批评除少数外，往往缺乏具体分析，或带有政治、思想、学术方面的成见。

“五四”以来，金圣叹的评点仍然引人注目，也仍然存在着评价上的分歧。胡适一方面赞扬金圣叹提高小说地位的“眼光”和“胆气”，但另一方面又抨击“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类注的白话文范！……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④。胡适自己没有将这两种看法统一起来。朱自清对金评的评价比较持中。他认为金人瑞是评点派中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应当给予重视和客观的评价。他说，金圣叹的一些观点如“烘云托月法”等“大约从八股文来，方法上与论兴趣诸家和声调论相近”，“但若能适可而止，也未尝没有用处”，而且，“不管说的怎么破碎，他的方法也是分析的。”⑤至于解放

① 董含：《三冈识略》卷九，《才子书》条。

② 见孙文玉《新义录》五十七引。

③ 李渔：《闲情偶记》三卷，《填词余论》。

④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2页，第2—3页。

⑤ 参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2—23页，第59—69页。

评价。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认识金圣叹的呼声渐高。不过，对金评的全面研究还很不够。

纵观近三百年来的争论可以看出，问题的焦点在于，金圣叹的评点究竟是否具有理论意义和理论价值？而要对此做出结论，则又必须回答，金圣叹的评点究竟是一种支离破碎的八股式文评，还是一种以独特形式表现出来的文艺批评、文艺理论形态？为此，我们必须首先解决如何对待评点的方法论问题。

人类关于文艺的理论思维、理论掌握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过程。恩格斯曾经谈过这样的看法：“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①人类关于文艺现象、文艺规律的理论思维也是如此。他的话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理论思维是一种历史地发展着的科学，从总体上看，存在着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片面到全面、由肤浅到深入、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的演进过程。处于这个过程各个阶段、各个时期的理论思维都有它们不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贡献。第二，理论思维因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不但中西不同，而且古今各异。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中间，很可能出现某种不平衡现象。恩格斯就指出过，“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②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从时代的先后和形式、内容的不同对某些理论形态进行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8—449页。